

二十個人的 史

ER

SHI

JIU

GE

REN

DE

L I

SHI



二十九个人的历史

汪云生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汪云生著 . -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9.2

ISBN 7 - 80040 - 347 - 5

I . 二… II . 汪… III . 中国共产党 - 历史人物 - 生平
事迹 IV . K827.7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6.875

字数:423 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25.50 元(膜)

引　言

还历史真实，让历史告诉未来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人和事，既包括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生，也包括已经发生了的往事。

人们常说：人生如梦，往事如烟。这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当然有其正确性——也许正因如此，所以才会使世人生发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无限感慨，以及轻视历史、漠视历史、甚至无视历史的情绪。

无疑地，从人类历史的总体来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浩渺世界上的匆匆过客，朝朝暮暮，似水流年，诸多往日，倏忽而逝，短短数十载，弹指一挥间。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生并非总如梦，往事亦非尽如烟，尤其对于那些特殊的人所做过的特殊的事和走过的特殊的路而言，更是如此。

应该看到，每个人既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又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古希腊有句谚语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他出世以前的历史，这个人永远不会长大。在中国的古语中也有“读史使人明智”这样的话。因此，在我们抬头向前走路的时候，还有必要低

头看看前人已经走过的路，回顾一下他们的历史，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走得更好。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悠长深邃、艰辛曲折且独具特色的一大支流，特别是跨进 20 世纪后的中国近代史，则更呈现出多灾多难、纷纭复杂、五彩斑斓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迷离之色。

然而，“时势造英雄”，愈是处于乱世，就愈需要英雄的出现，也愈容易“造”出英雄。也许正是由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多变，所以才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多彩、极其耐人寻味和把玩、极具启迪意义的无数个人的历史。

当然，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沧海横流，才见壮志豪情。在一个需要英雄、也容易“造”英雄的时势面前，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英雄，只能由历史来检验。

在那些数不清、说不完、剪不断、理还乱的不同的人共同编织的多彩历史乐章里，曾经有过一个由 29 个人构成的特殊群体。而之所以说他们特殊，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年代里、特殊的环境下，身处于人生特殊的年龄段，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走过了 一段十分特殊的人生历程。

这 29 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早期的风云人物。后来被称为中共史上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这 29 个人的名字分别是：

王明（陈绍禹）、孟庆树（绪）、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陈昌浩、陈原（源）道、朱阿根、朱子纯（自舜）、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民、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肖特甫、杨尚昆、张琴秋、张闻天（洛甫）、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盛忠亮、袁家镛、徐以（一）新。

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 3 人当时是团员，即孟庆树、

朱子纯、徐以新），但他们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却是在苏联发生的。

为了解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迷幻，在开始讲述这29个人的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来审视一下他们所置身的历史大环境。

毛泽东曾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便焕然一新了。”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初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共产党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促使中国各地建立起了许多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在来自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世。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仍然受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她的许多政策、方针、路线的确定，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制定的。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北伐战争与大革命运动的兴起，都与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息息相关。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提供的种种帮助（既有精神思想上的，也有物资武器上的），是史学家们所共知的。在这些帮助中，包括两所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校：一是在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创办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一是在苏联莫斯科市郊创办的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

这两所学校，建立的时间不同，创办的地点也不同——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5月，地处位于亚热带的中国广州；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地处位于亚寒带的苏联莫斯科。但是，他们却肩负着同样的目的。

这个目的，可以通过两所学校建立的时代背景得以说明：

以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已经明确为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盘踞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可是，面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庞大军阀势力，革命的军事骨干和政治骨干都显得十分缺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事实证明，只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尤其是人才准备，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建立培养革命骨干力量的学校。

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便是为着承担这一使命而设立的。

当然，尽管这两所学样都是为了培养当时中国革命所需要的人才而设立的，但她们培养人才的侧重点与角度却有所不同：黄埔军校侧重于培养军事干部，中山大学则侧重于培养政治骨干和理论人才。

中山大学成立后，其招生对象为中国的革命青年，而以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送的党、团员与革命青年为最多，也包括一些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和冯弗伐等，都曾经是中山大学里的一员。

“天有不测风云”，1927 年中国相继发生了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制造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中山大学的招生对象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招收国民党籍的学生，而以中国共产党秘密选送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革命青年为生源。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1930 年中山大学停办。

当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中山大学的招生性质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中山大学内部的气氛也就变得不如以前那样宁静

了。其主要特征就是王明的迅速崛起和王明教条宗派的快速形成。

王明，这个既饱含革命热情又充满权力欲望的年轻人，凭借着自己特有的聪明与心机，借助于其恩师米夫的力量，很快掌握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的权力枢纽，并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山大学的局势，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始作俑者。

在王明的积极活动和多方笼络下，他周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宗派小团体，这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王明教条宗派”。

王明教条宗派之所以能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兴起，并在那里翻云覆雨，而且在回国后又执掌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绝非偶然；而是由下述两个原因造成的：

其一，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私心有关。

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共渡过了一段十分短暂的平静期，很快便进入了角逐权力的争斗。这场争斗的主角是斯大林，他始终把握着争斗的方向，控制着争斗的局势，并以其高明的手段把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一打倒，排斥出苏共领导核心之外。

斯大林在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后，相继掀起了“反托派”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动，这场运动，必然涉及到位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

因此，这就为王明教条宗派的兴起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客观环境，使他们可以借助于斯大林反对其对手的机会，达到打击自己在中山大学里的反对派的目的。

另外，斯大林在打击对手时所用的手段与方法，如扣帽子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也为王明教条宗派提供了斗争的模式与样板。

这就是王明教条宗派产生的客观原因。

其二，从王明本人及其某些追随者的思想与性格方面来看，又可以发现王明教条宗派产生的主观原因。

就王明而言，他基本上是一个倾向于革命的青年，而且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却是一个脱胎于旧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年轻人，因而身上仍然残留着很多与共产党人的品质格格不入的地方。

中山大学一成立，王明就很想到那里去学习。他认为这对于自己这个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和豪情满怀的革命者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成长机会。

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错，因为革命无罪，想成为中国革命人才的想法也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在那时那地，不这样想的人才是有罪的，才是错误的。

但是，想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做成做不成则更是另外一回事。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观念中就存在着许多对于“人才”的认识偏见，束缚着人才的形成与自由发展。

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且，在关于“读什么书”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的逻辑向下发展，自然地，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便陷入了一种僵化的即教条主义的误区——学了几本儒家经典的小册子之后，能够活学活用的人不多，但生搬硬套、寻章摘句、生吞活剥的人反而如过江之鲫、不绝如缕。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然处于风云激荡的年代，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已被推翻，享受“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已被打破，但是，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教条式的思维方法却仍然存在着。

本来，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仔细汲取马列主义经典论

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的事，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着它们而建立起来的，也是按照它们所指引的方向而前进和奋斗的。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一贯性而导致把马列主义著作当作新的“圣贤书”去读，则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对于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里的兴起和泛滥，以及他们所采取的种种宗派活动和斗争方法，共产国际不仅不制止，反而加以纵容和包庇。要想解释这里面的原因，就必须先了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私心。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共产国际正是由苏共一手建成的。作为苏共当家人的斯大林，有着较强烈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中山大学是由斯大林一手创办起来的，他这样做一方面有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也有控制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企图。

正因如此，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仅不制止王明教条宗派的种种逆行，反而把王明教条宗派作为精心培养的对象，使其在回到中国后不久，便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的位置上。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复苏阶段。在经历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慢慢向上攀升。但是，由于王明教条宗派的上台，使本就举步维艰的中国革命再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从1925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总是在右倾和“左”倾之间来回荡秋千，在共产国际的干涉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其中以王明“左”倾教条宗派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损失为最大。

10年的时间不算短，在这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中国革命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当然，历史不可能假设。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更愿意挥去那10年中的诸多阴影与磨难。

对于后来者而言，所能做到的不是去假设历史，只能是去总结历史，总结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历史上的幸与不幸，总结历史上的所得与所失，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利钝和是非非。

在本书中，不可能把1925年后在中共史上所出现的右倾与“左”倾错误全部涉及到，更不可能把它们全部予以详述，而只能阐述这两种错误中的一种，即“左”的错误。而且，即使就“左”的错误而言，我们同样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仅就其中的一部分人进行较详细的描述。

在中共史上，王明教条宗派所犯的种种“左”倾错误无疑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我们才选取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叙述一下那段鲜为人知但却很有价值的历史。

当然，它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过去，而是体现于现在和将来。只有在真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过程中，人们才会在“悟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的深沉思绪中更认真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如前所述，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指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由共产党人所组成的特殊群体。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组织，这一称谓也只是人们习惯上的称呼，并不表明他们是雷打不动或是铁板一块的固定不变的组织，而是表明，这29个人曾经因某种原因而走到了一起。

在走到一起的过程中，有的人是自觉的，有的人是不自觉的；在走到一起之后，他们也没有一直照原来的步调与步骤永远不变地继续向下走，而是随着在革命实践中所受磨炼的不断增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有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详细情况及其演变的具体过程，在本书的后面将会作出大量叙述。在此，我想先着重说明下面一个问题：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有的是因为主观上的错误，有的则只是历史的误会和巧合。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前进的，一个人绝不可能一辈子或是几十年都呆在一个原点上僵立不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随着主观意识和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一个人也会发生与以前很不相同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外乎朝两个方向上运动着：一个是前进的方向，另一个是后退的方向。总之，绝不会原地踏步。

就曾经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来说，他们的人生历史也是遵循着“前进”和“后退”这样两条道路发展着的。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千锤百炼，“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命运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人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永远受到后人的怀念，如沈泽民、夏曦等；

有的人意志消沉，中途掉队，但经过挽救仍然取得了进步，因而得到了人民的谅解，如陈昌浩等；

有的人叛党而去，作了敌人的工具，永远受到人民的唾骂，如李竹声、王云程、朱阿根、袁家镛等；

有的人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当认识和改正后，仍然受到人民的尊重，如博古、张琴秋等；

有的人错了之后仍然错上加错，不仅不思悔悟，反而越陷越深，与正确越离越远，以致最后堕落到与党和国家为敌的地步，如王明、孟庆树等；

有的人虽然曾追随王明，与他一起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在经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后，很快认清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实质与错误之所在，立即与之分道扬镳、并与教条主义者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如王稼祥、张闻天等；

有的人只是因历史的某种巧合而与王明站在了一起，成为名义上的王明教条宗派之一员，但实际上并没有做过什么宗派教条主义的错事。当然，这些人尽管很快与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仍然因历史的原因而在后来的某些运动中受到牵连，遭到批判，而他们凭着无比的信心与勇气，在渡尽劫波后，又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如杨尚昆、徐以新等。

上述种种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方向各异，但无不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人都不会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每个人的生命之旅也不会总是沿着单一直线性的方向与规则，始终如一地向前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无疑不能抱着“是非成败转头空”和“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嬉戏之态来对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那种观点，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味道，可说是一些失意、落寞的文人骚客面对历史而发出的哀叹声。

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作为以唯物主义为指针的历史研究者，更可取的态度应该是以鲁迅先生的名言为导向：“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历史是无言的，也是无情的，但人有情，也有言。有情的人类只有正视和直面无情的历史，才能读出无言的历史中所蕴含的有情的一面，并从历史上汲取到更多有益于人类自己成长与发展的养分。

无论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的评判，历史都是最有发言权。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历史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弥足珍

贵的价值。有人曾说：“历史是一个宝库，人类可以从中获取很多有用的东西。”

这句话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对此，曾经开创中国历史上空前盛世局面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用来说明历史的极端重要性：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

诚矣哉，斯言！大矣哉，斯言！

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也无意于改变历史，更不需要改变历史。我们唯一应该做也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从历史中汲取一切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力图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正视历史，尊重历史，还历史以真实，让历史告诉未来，从史实中求史识，这就是本书作者写作此书的唯一宗旨和最大愿望。

目 录

引 言 还历史真实,让历史告诉未来

第一章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诞生	(1)
一、红色莫斯科:群英荟萃	(3)
二、年轻的俄国老师和他的得意中国门生	(13)
三、小试牛刀:王明舌战任卓宣	(24)
四、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30)
五、权力之“争”:背对背,还是面对面	(39)
六、野心家与政治帽子	(46)
七、年轻的理论家教训中共代表团	(55)
八、难产的“十天大会”分娩了“真正的 布尔什维克”	(61)
九、“中大”的解散只不过意味着真正的 斗争才刚刚开始	(65)
十、“二十八个半”,说得清,还是说不清?	(71)

第二章 从右到“左”,从“左”到“极左”	(79)
一、从“这里”回到“那里”	(84)
二、一位“怀才不遇”的人的断肠恋	(88)
三、冉冉升起的“理论新星”	(94)
四、纸上谈兵:与撒翁论战	(101)
五、“失足理论家”祭起“左”倾理论的神剑	(110)
六、还嫌李立三不“左”	(115)
七、怎一个“权”字了得?	(123)
第三章 后生走上前台	(128)
一、峰回路转:一份“福音书”	(130)
二、谁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142)
三、“洋教条”替代“土政策”	(149)
四、谁在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按钮”	(154)
五、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分裂	(159)
六、“系统改造”中国共产党	(164)
第四章 祸起萧墙(一):中央苏区里的“左”祸	(170)
一、醉翁之意	(172)
二、飞向中央苏区的“钦差大臣”	(175)

三、祸起萧墙之内	(178)
四、变生不测于外	(182)
五、事情正在起变化	(184)
六、别无选择的选择	(186)
 第五章 祸起萧墙(二):血色的“布尔什维克化”	
.....	(189)
一、新集会议上的龙争虎斗	(189)
二、血幕的预演	(192)
三、鲜血流淌白雀园	(196)
四、沈泽民坚持鄂豫皖,张琴秋随军西征	(200)
五、张琴秋促会小河口	(204)
 第六章 祸起萧墙(三):一夫当关湘鄂西	
一、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吗?	(211)
二、一纸训令,错杀万千人	(214)
三、在最该反思的时候,夏曦却做了错误 的反思	(218)
四、两位红军高级将领的血,就这样白流了	(221)
五、一个残酷的“玩笑”:从“肃反”到 “反肃”	(225)